

華人家族企業 與股票市場

鄭宏泰 何彩滿

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

鄭宏泰 何彩滿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2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九十四號

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
Chinese Family Enterprises and the Stock Market

編 著：鄭宏泰、何彩滿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 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 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 次：二零一二年七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94-0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在歷史的長河上，2010年也許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但是在華人家族企業和股票市場發展的問題上，卻顯然頗有一些值得玩味之處。且不要把焦點放在那些大富之家為了爭家奪產而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甚至要對簿公堂的故事，單單集中在兩則看來平常不過但實質影響頗為深遠的新聞上，已確實令不少人思潮起伏、難以平靜了。其一是國美電器創辦人黃光裕家族與專業管理人員陳曉因為爭奪公司管理權而反目，要在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公開對決；其二則是新加坡交易所宣布正洽談收購澳洲證券交易所，藉以強化新加坡交易所作為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可惜計劃最終被澳洲政府否決）。前者很可能會令人想到西方管理學所強調的「管理權與控制權分離」（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問題，後者很容易令人想到全球化年代的區域競爭問題，核心所在則是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

長久以來，學術界對華人家族企業的內在動力、公司管治、企業文化，以及社會網絡等問題，均有不少深入研究，唯獨對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的關係—尤其是家族企業如何運用金融資本或相關法規以提升公司管治等層面，則一直未見系統、深入及充份的分析，令人費解，亦覺惋惜。眾所周知，股票市場能否健康發展和有效運作，與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系統及商業文化等是否同樣健康及有效運作息息相關、緊密相連。如果任何一項制度存在漏洞，股票市場便難以有效運作，

或是更容易被操控，令公眾投資者失去信心，因而大大削弱股票市場應發揮的巨大力量。

回溯歷史，當歐洲打開股票市場大門而踏上現代資本主義大道之時，以農立國的中國仍固守著本身走了數千年的重農輕商、農本商末之路，把農業的地位置於商業之上，不但生活模式、家庭結構以農業為核心，連社會組織、政治制度、道德價值、傳統文化，以至日月時令的計算亦緊隨農業的循環。地理上的關山阻隔及文化上的千差萬別，並沒像過往般令東西之間各自為政、各有生活。事實上，歐洲在全世界拓權殖民、開疆闢土所採取的方式，並非驅車策馬由陸路而來，而是乘船踏浪由大海湧至，令中國以至全世界發生了亘古未有之巨變。

東西華洋之間方方面面的巨大差異令彼此間無法有效對話溝通，戰爭變成強凌弱、大欺小的手段，逼令敗方接受勝方的「遊戲規則」。地處偏南一隅，原來只屬小漁村的香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被英國佔為殖民地，而香港開埠不久頒布的《公司法》，既被視作西方現代商業在中國土地上播下種子的基礎，亦成為引入股票市場機制的核心，令荒涼的小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大小商賈及中外移民龐集之地，商業貿易極為活躍。

香港開埠後，居民迅速放下漁網、停止務農，逐步走上營商或受僱之途，滿清皇朝掌控下的中華大地則重農輕商如舊，絕大多數百姓仍以種地為生。在強大外敵面前，屢嘗敗績的滿清政府雖曾多次推行改革自強運動，但總因為未能洞悉全局、只知其表不知其裏，或是推行上不夠全心全意等而未竟全功，而重農輕商的傳統思想更是始終如一，從沒動搖。說得具體一點，被視為奠定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基石的《公司法》，要等到1904年1月21日才在晚清朝廷的首肯下頒布，名為《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其推動商業貿易的步伐較香港足足晚了接近半個世紀。

現代商業制度在中華大地紮根的過程並不平坦。《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頒布不久，即遇上了改朝易代、清室覆亡的巨變，令政策失去了延續性。至於隨後的南北對峙、軍閥割

據、戰火不絕，以及國民黨退守台灣而共產黨則取得了大陸政權，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在大陸實行共產統治等，均令這套法例難以具體而全面地落實，相關的商業倫理、操守與價值亦難以紮根。

相對而言，華洋混雜、東西交匯的香港，不但是中華大地上率先落實重商主義的地方，其推行過程更從沒間斷，而政治環境較平和穩定、經濟制度較自由開放、司法制度較獨立健全等，更令香港逐漸建立了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又以股票市場的透明、高效與資金進出自由等，贏得了中外社會的高度認同。

作為前英國殖民地，香港股票市場在1970年代由英資壟斷的格局走向開放，利用股票市場這個現代資本主義重要機制，為不少華人家族企業創造了開拓發展空間的機會，令其企業實力大幅提升，商業版圖不斷擴大，並迅速打破英資財團壟斷香港經濟的局面，華人家族企業的公司管治與企業文化亦隨之發生脫胎換骨的轉變，令人側目。雖則如此，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公司管治及企業文化相比，很多已經上市而且極具規模的華人家族企業，仍然呈現某些諸如強調家族主導及重視人脈關係等特色或作風。

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在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有機結合，既印證金融資本主義可以在華人社會紮根，亦說明家族企業其實並非一成不變，具備極高的吸收與調適功能，可以在瞬息萬變、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克服不同困難，尋找生機。若華人家族企業能夠在香港股票市場由壟斷走向自由開放的環境中茁壯成長，我們自有理由相信當中國內地及台灣的股票市場亦能從相若過程中獲得巨大發展動力，令其企業迅速蛻變。

沿著這一思考脈絡，我們提出應從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的有機結合上理解經濟發展、公司管治及企業文化等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亦注意到，在全球化年代，不論是企業、股票市場或經濟體系，單打獨鬥已非有效提升綜合競爭力的策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及歐元的出現、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發展，以至長三角、珠三角及前文提及的新加

坡交易所計劃收購澳洲證券交易所等，都是區域合作的重要例子。

華人家族企業走過的曲折道路及兩岸三地股票市場的不同發展軌跡，推動我們不斷探索和思考，本書的出版則是將思考和想像轉為實際行動的結果。此實際行動其實包含了兩個層面，其一是公開演講，其二則是論文結集出版，而令上述連串具體行動得以落實的重要基礎，是我們一直大力推動的「華人家族企業研究系列」項目。

籌辦此系列研究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為了延續黃紹倫教授始自1980年代有關華人家族企業的研究學風，探索華人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機遇與挑戰。其二是為了促進跨學科的切磋、討論和互動，為相關研究人員打造一個有利大家進一步合作的平台。其三則是希望可以走出學術研究的象牙塔，與社會大眾對話、交流和分享。基於這些不同考慮，亦明白本身的力量有限，我們在2009年初與香港歷史博物館洽談合作，得到他們的首肯和支持，在該年年底（11月21日）共同開展了此系列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其後（2010年6月）又落實了相關的出版計劃。

第二次講座的日期是2010年7月3日，與上次一樣，偌大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當天同樣座無虛席，市民大眾踴躍參加，反應熱烈，而講者取材各有不同，演講生動扼要，不但加深了參加者對問題的認識，亦引起了他們繼續探求的興趣，令人鼓舞。本書收集的九篇有關華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的文章，主要來自當天專家學者演講稿的修訂版本，可讀性極高，我們以此作為「華人家族企業研究系列」的第二冊，希望能成為相關研究專家、學者、經營者、學生及普羅大眾的有趣讀物。

本書的第一篇文章來自高承恕教授。針對以往學術界並無深入研究華人社會各式關係，因而忽略中國社會黨派，與華人社會實體相互之間的連帶關係，高教授利用「關係」為樞紐，以「關係社會」作為背景脈絡，重點探討家族企業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係。論文以「舊瓶與新酒」為副題，顯彰在歷史發展

過程中，華人社會家族的重要性，並陳述家族與環境氛圍、金融變革的辯證關係。透過高教授的深入探討，我們發現家族企業的發展範式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經濟的時代變遷，不同的新元素加入社會實體之中。高教授綜合多年對台灣中小企業訪談的經驗，考察家族企業與人際連帶關係的強大韌性，論文針對「關係社會」為切入點，為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之間的關係，建立了重要研究資料。透過家族企業運作的探討，提出企業規模與股票市場並存共生的矛盾現象，令我們更重視家族企業與日常生活的邏輯關係。高教授多角度的高度思考，以宏觀政治經濟視野，深入研究家族企業，成果豐碩，研究值得繼續追隨。

利豐集團的成長可說是工商管理學院的重點教材和研究個案。馮邦彥教授在本書中重點考察利豐集團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短短30年間，上市、私有化、再上市的傳奇，從而揭示這一家族企業如何從第二代掌舵人馮漢柱傳承至家族第三代後，把利豐集團發揚光大，躋身全球跨國商貿舞台的關鍵。創辦於1906年的利豐，經歷了戰後、西方金融動蕩、1980年代中英主權移交等的新時代，終於在1981及1986年，相繼由馮國經、馮國綸兄弟接任董事總經理，標誌著利豐正式從舊式家族商號，蛻變為現代上市企業巨擘。馮氏第三代帶領專業化的管理層，成為香港私有化和收購的先驅，透過連串收購合併的商業活動，在1995年以來，利豐再先後收購英之傑採購服務及太古貿易，這三間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穩佔香港出口貿易公司三甲的貿易公司，終於順利歸一。馮教授綜合歷史性的英商主導的貿易業時代，並啟發對利豐崛起成為香港以至於亞洲地區最龐大的貿易企業的研究。

邵氏企業乃華人社會另一傳奇企業。邵氏企業旗下的邵氏父子、邵氏兄弟兩公司一直以「父承子繼」及「兄終弟及」的方式轉移管理權，在外人看來，可謂極具家族經營色彩。鍾寶賢教授便是從追溯邵氏百年以來的企業轉變過程中，探討邵氏王國如何從傳統家族企業蛻變成上市公司的軌跡；並由家族各房競爭制約，呈現不和與競爭，又能共同聯合對抗外敵集團

之行動，分析邵氏王國不同利益圈的細分和對壘。鍾教授從歷年邵氏年報，探討出自1981年方逸華擔任邵氏董事後，邵氏第二代成員（如邵維鍾、邵維銘、邵維錦）均一致退出董事局，綜合出邵氏一如傳統家族企業，未能成功脫離家族色彩，接班人一直懸而未決，家族企業的承繼顯見暗湧。鍾教授對邵氏發展軌迹與承傳的探討和研究，讓我們對富甲一方的邵氏企業有更深刻的認識。

鄭宏泰博士、黃紹倫教授關注到國際社會對華人企業的研究議題，針對建構私營企業的核心力量—家族企業的發展潛能為研究中心，以東亞銀行近世紀發展為一例，分析及追蹤香港的便商、利商環境，如何吸引中國內地、台灣以至東南亞的財團來港集資的因由。論文除了集中華人企業關係網絡外，也綜合東亞銀行發展經驗與特質，拆解經濟和管理制度的因素，如何把東亞推向問鼎中亞的跨地域私營企業。論文首先闡述金融歷史背景，以老牌家族企業為個案，詳細分析企業的擁有權與專業管理分家的平衡點，並以東亞銀行為微觀例子，剖析東亞銀行借助架構和有限公司制度，在股票市場上籌集公眾資本的強韌力，以及分析私營企業在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不同發展步伐的環境下，一直保持穩定的原因。此外，論文也關注到企業上市與家族控制比率的平衡，深入討論華人家族企業血脈傳承上的情意結。同時，此論文亦另闢蹊徑，援引歐洲聯盟的例子，提出了「海灣港」（上海、台灣及香港三地股票市場）的構思，探討華資企業在大中華經濟區的金融發展上的機遇和阻力，值得我們深思和繼續研究。

何彩滿博士的研究焦點集中於台資企業，論文主要介紹一間頗具規模的台灣家族企業—寶成集團，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面臨甚於以往的挑戰時，如何借助香港躋身成為全球最大運動球鞋供應商。研究討論到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和台灣，在1980年代面對貨幣升值、勞動成本上升、出口配額的壓力和威脅時，蔡其瑞、蔡其仁、蔡其建兄弟透過分拆、合併、重整集團，以及藉著法人操作關係與地區優勢，帶動企業營運能力。論文闡述了蔡氏家族、台灣寶成和香港裕元之間的互利合作關係，何博

士的研究案例，使我們充份瞭解到企業如何巧妙利用港台兩地金融舞台，應變全球化的挑戰。

張國慶教授從社會學理論出發，以台灣企業私募與集團論述，研究企業的私募機制和發展範式，進一步分析各籌資、集團介入策略的社會意義。張教授以私募為考察中心，探討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間的關係，以至股權分散、集中現象，展示出台灣社會的整體形象。透過台灣企業私募自2002年以來的發展，研究出上市公司採取私募的不同範式，尤其是台塑家族控股的範式，以至為股市建構帶來的結構性轉變。從台灣企業籌資發展的不同階段，瞭解到台灣上市公司的文化基石與不同市場的條件。同時，論文綜合大量官方統計資料，再運用 Fligstein 提出的組織場域 (organizational field) 學說，以數據和理論疏解企業組織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讓我們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張教授研究從台灣集團企業，連繫到全球發展的脈絡，帶出關懷與關注台灣企業、資本市場與社會實體發展的新角度，別樹一幟，值得重視。

以西方歷史及社會學理論的視野切入，陳介玄教授考察西方家族企業與資本市場的關係，以西方金融及貿易家族企業為借鏡，探討背後資本市場的面貌。陳教授觀察到現代社會學經典，鮮有觸及家族企業和資本市場關係討論，因此，論文首先通過西方金融組織史來分析，從 Rothschild 家族—西方公債、股票及公司債為主的資本市場一位舉足輕重的造市者的傳奇，重新剖析由十九世紀屹立至今的金融家族企業，補充了馬克思及韋伯、以至哈佛企業史忽略此層面的空白。論文建基在三百年金融史上，以歷史流變為脈絡，探討資本市場及家族企業在近代發展上的組織史意義。陳教授扼要地闡述西方三百年資本市場及國際金融的發展，更透過具體的 Rothschild 家族經驗，釐清社會經濟結構和家族企業的連接點，帶領讀者精準界定西方家族企業和市場的議題，這個精彩的定位，對華人家族企業以後的組織和制度發展提供一定的貢獻，值得繼續研究跟進。

同樣利用社會關係為引子，李宗榮教授留意到華人家族主義，已成為東亞經濟研究者的熱門研究課題，在台灣經濟運

行中，尤其以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研究為人重視。家族主義的抬頭，意味著企業組織形態仍然屬於傳統親屬關係的規範。李教授注意到當代研究者，在處理異常複雜的集團整合或分殖或聯繫的過程中，可能忽略了市場中潛藏的聯繫力量，因此，嘗試系統化整理集團之間的親屬網絡。論文深入討論總體親屬網絡在原型的台灣市場中的力量，探討其存在價值和結構特徵。面對目前零星的研究資料，李教授進一步釐清家族聯盟對當前市場運作帶來的影響，以及重新規範企業集團的「形式」與「邊界」的議題。李教授對台灣企業集團間的血緣網絡的討論，開展了對上層階級構造的政治、社會脈絡的研究方向，透過論文對台灣企業親屬網絡的探討，我們將更能掌握台灣企業在經濟、政治與社會上的影響與挑戰。

林寶安教授以台灣著名車廠三陽工業歷史為主線，勾劃出涉及的黃家（黃繼俊和黃世惠家族）及張家（張國安家族）與三陽工業關係的演變，並揭露鮮為人知，三陽工業與本田之間的數十年利益衝突。論文圍繞從三陽工業創辦以來，研究黃繼俊、張國安、黃世惠與本田之間關係演變背後的歷史因素。論文分析三陽工業的兩位巨人：張國安與黃世惠在企業發展分道揚鑣的因由，並追溯到家世背景、企業運作模式和文化差別，同時探討家族長久以來被定位成特定資本企業，會否產生跨資本營運的無形障礙。透過林教授對三陽工業和創辦與接班人的分析，我們可窺探家族企業與企業領導人，對於企業經營的關鍵性影響。林教授的資料綜合和切入點新穎，值得後續研究者參考。

與第一次公開演講暨出版工作一樣，此事能夠順利完成，同樣因為獲得了各方友好的支持協助。在此，讓我們向研究團隊的後勤支援人員，包括劉方中先生、陳藝彬先生、袁詠琪小姐及葉素芝小姐等表示感謝，他們為著推動不同研究項目而四出搜集資料，不斷在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之間奔波，並經常要對著那些古舊的報紙或微縮片，逐點逐滴地篩選出有用內容。正因為他們耐心的工作和不斷的努力，我們各項研究項目才能取得豐碩成果，並且獲得各方認同與肯定。

還有，我們必須向香港歷史博物館—尤其是教育活動組的工作者—致以衷心謝忱，他們不但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亦在各項活動上鼎力支持，令相關活動能夠成功舉行，並且獲得各界好評。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向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亞洲研究中心）的眾多同事表示謝忱，他們表現專業，大小事務都給予很大支持，妥為安排。可以說，沒有各方的指導、支持和配合，本計劃及本書的出版，便沒可能實現。

最後，我們必須向各應邀出席此次活動並作公開演講的專家學者表示感謝，沒有他們百忙中抽空出席及對論文的完善修訂，相關講座與出版同樣只屬空談。與此同時，我們亦要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一直以來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該委員會慷慨的財政資助（項目編號：754908），是這個計劃得以順利展開、維持和完成的必要元素。至於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對我們有關兩岸三地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發展的研究資助（項目編號：RG012-P-10），則既支持了本書的出版，亦為後續研究提供了更大空間，在此必須一併表示衷心謝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團隊的高度專業和大力協助，亦是此書最終可以出版的關鍵，我們同樣銘記於心，並致以最高敬禮和謝忱。

雖然得到各方友好和機構的鼎力相助，但因我們才學有限，紕漏難免，敬請專家學者及普羅讀者見諒，亦請大家不吝指導批評，讓我們往後的研究可以做得更紮實、更豐富。如對本書有任何意見，請直接與我們聯絡。

鄭宏泰 何彩滿
2012年4月

目錄

序	vii
1. 「關係社會」中的家族企業與金融：舊瓶與新酒 高承恕	1
2. 利豐上市、私有化與再上市的經驗 馮邦彥	21
3. 從「家族經營」到「上市公司」：邵氏企業的蛻變 鍾寶賢	37
4. 問鼎東亞：公司制度、股票市場與東亞銀行 股權變動的探索 鄭宏泰、黃紹倫	53
5. 香港裕元與蔡氏家族 何彩滿	95
6. 台灣企業私募模式與台塑集團控股分析 張國慶	119
7. 家族企業與全球資本市場：從Rothschild家族談起 陳介玄	153

8. 市場中的血緣：台灣企業集團間親屬網絡的考察 李宗榮	175
9. 合夥與接班：台灣三陽工業與家族企業 林寶安	211
編者、作者簡介	265

1

「關係社會」中的家族企業 與金融：舊瓶與新酒

高承恕

「關係社會」與家族企業

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凡談及華人常講的「關係」，都很難給予明確的定義。畢竟針對華人而言，華人社會的各式關係總是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不會加以深究。然而華人的各種複雜關係始終存在，即使中國內地（下稱中國）歷經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或者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但華人的關係卻並沒淡化，仍具有強大的支配力量，並且無法單純以西方既有的概念加以釐清。例如，吾人不能單純以西方的「組織」概念來說明中國共產黨此一組織的發展。如果納入中國社會經濟的關係元素，則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其實是黨中有派、派中有系。那麼倘若要深入探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就必須要注意中國共產黨當中的「太子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下稱共青團）所具有的支配力道，而不能將中國共產黨單純的視為一個「同質體」。反之，應發現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關係，才能發現其關鍵的支配力量。所謂的「太子黨」或共青團，正是彰顯一種關係連帶。對於華人社會的關係，本文在此並未要做出簡單的價

值判斷，而是強調對於理解一個華人社會實體而言，不論是探討哪一個領域，以關係作為一個切入點，都有其必要性，它是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

本文陳述重點並非在於「關係社會」此一名詞的說理與探究，而是把關係社會作為一個背景脈絡，來探討家族企業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係。本文以「舊瓶與新酒」為副標題，在於凸顯華人社會家族企業的歷史發展過程，與大環境金融變革之間的辯證關係。家族企業的發展形式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經濟的時代變遷，總會有些新的元素加入其中。就吾人多年來針對台灣中小企業訪談的經驗而言，總是能體認到家族企業發展的強大韌性，亦即立基於人際連帶關係所產生巨大力量的一種韌性。因此，本文以針對華人地區特有的關係社會作為一個背景脈絡與切入點，來探討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之間的關係發展。由於西方家族企業與華人家族企業因為其長時段所處的社會經濟脈絡不同，故以西方企業的論理方式解釋華人社會的家族企業時，其適切性或許值得商榷。

新世紀啟始，台灣許多中小企業的第一代企業主紛紛交班至第二代。此一現象，在吾人近期於台灣及中國進行訪察時可看出一些端倪。第二代中小企業主都有一個鮮明的特色：就是多數受過良好且完整的高等教育，這是第一代企業主有計劃且刻意培養第二代接班人的結果。這無疑意謂著台灣家族企業有其內部性和內生性的長期規劃，也意味著台灣家族企業的發展有著長期可追蹤的歷史脈絡存在。

本文對家族企業與股票市場發展關係的探討，主要鎖定台灣與香港兩個社會領域。之所以不談現今中國的家族企業發展，主要是因為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有其特殊性。中國自1949年革命成功後，社會主義早已成為中國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結構的一部份，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前，家族企業根本不可能出現。然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關係社會的巨大力量再度使中國家族企業開始發展。不過，基於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仍然會和台灣或香港有所不同，所以本文暫不處理中國的家族企業發展問題。

然而就長時段而言，特別是以近代中國百年來的興衰而論，不論是政權的更迭交替，或者是大小的內外戰爭不斷，都無法完全抹除家族企業的存在，家族企業可說是整個中國企業的概括。像國有企業之類，可能會隨著政權的更替而改變，但是家族企業卻是孕育自民間社會，其立基點並非受到國家政治面的全然操控，而是建立在社會面的家庭、家族及人際關係網絡等基礎之上。雖然1949年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截斷了家族企業在中國的發展，但部份家族企業的命脈卻轉移到香港及台灣，並進而在這兩個島嶼地區延續家族企業的歷史發展，香港的董浩雲家族就是一個例子。董浩雲出生於中國寧波定海縣，父親董瑞昌亦為商人，他在年幼時移居上海讀書，並於上海創業，後來才轉至香港發展。董浩雲是航海業巨擘和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的創始人，¹其長子董建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亦即，中國在1949年革命後，一批家族企業轉至香港發展，另一些家族企業則轉往台灣發展，延續至今已到第二代接手，例如徐旭東所屬的遠東集團、尹衍樸所屬的潤泰集團，以及苗豐強所屬的神通集團。

透過台灣與香港兩地，我們的確可以看見家族企業在歷史發展上的延續性。縱使外部的政治因素彰顯一定程度的力量，並對華人地區的家族企業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但建基於社會基礎的家族企業，卻有其自主性以及歷史承繼的延續性。

至於股票市場在華人地區的發展，則是另一個有趣的部份，這部份發展至今時間並不算長，卻愈來愈具強勢。因此，不論在台灣、香港甚或後起發展的中國，以及廣泛的華人地區，資本市場的影響扮演愈趨關鍵的角色。如同本文前述，吾人先把焦點鎖定在台灣與香港兩地，暫時不談中國。但是，關係社會的概念既是可以廣泛解釋整個華人社會的有利工具，是以我們該從關係社會的角度，來看待台灣與香港兩地家族企業

1. 各公司的全名表列於本文附錄1。